

汉代甲渠候官的日常管理*

张 文 瀚

〔关键词〕 汉代;甲渠候官;日常管理;文书掌控;行塞;召会

〔摘 要〕 研究甲渠候官的日常管理,可以为深入认识汉代边郡候官的形态和功能,进而研究汉帝国的日常统治提供视角。甲渠候官主要通过文书掌控、行塞和召会等三种手段进行日常管理。文书掌控以日迹簿、作簿、邮书课三类文书逐日、逐月记录部隧的工作事项,以确保候官及其上级机构能严密掌控各部隧吏卒的工作状态。甲渠候官戍吏还通过行塞的方式,定期或不定期亲临防区巡行视察,以掌握部隧的实际工作状态。另外,甲渠候官以书檄、官记等文书形式传召部隧吏卒在限定时间到候官署汇报工作,或到候官署接受临时性事务安排,是为召会。三种手段互相配合,对维持甲渠候官的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

甲渠候官是位于汉代居延屯戍区的军事候望机构。作为设置于汉代北方边郡的候官,它和其他诸多候官一起,在维护汉朝边防安全方面曾发挥着重要作用^①。然而,汉籍中关于候官的记载仅寥寥数语,因此,汉代边郡候官,包括甲渠候官的构成、职掌及运转等情况一直无从知晓。

自 20 世纪初叶始,在我国西北的汉代边塞遗址先后发现数万枚简牍资料,其中不少是汉代候官及其下属机构的日常工作记录。例如,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20 世纪 70 年代对额济河流域古代遗址的发掘中,仅破城子甲渠候官遗址就出土了一万三千余枚汉简,其他候官遗址也出土了数量不等的汉简^②。这些汉简资料大多是汉代候官与其上下级机构之间的往来公文,揭示了汉代候官在诸多方面的真实情况^③。随着这类汉简资料的发现和相关研究的展开,汉代候官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然而,目前的研究多是集中讨论候官的设置、规模、人员管理及后勤保障等基本情况。即使是对研究材料最多的甲渠候官,研究者的工作也基本上局限于考证甲渠候官的机构组成、职掌、人事管理、后勤供应等方面,对候官的日常工作及运转状况很少关注^④。其实,汉帝国对居延屯戍区的统治,终究要由基层的候官等屯戍机构在具体工作中执行和落实。候官及其下属带有高度重复性的日常活动虽然

*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汉代边郡候官的日常运行”(2014-GH-448)。

① 笔者曾据现有简牍资料考证得知,河西四郡所辖的候官数量多达三十一个。参见张文瀚:《汉代边郡候官研究——以甲渠候官的日常运转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13 年,第 14 页。

② 据统计,20 世纪 30 年代西北考察团在 A8 破城子甲渠候官遗址发现并出土 5216 枚汉简,1972 至 1976 年居延考古队在该处遗址发现汉简后经整理公布的《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一书,载编号为“EP”开头的破城子出土汉简,共计有 7963 枚。因此,甲渠候官遗址出土的汉简,除了少量残简能够缀合之外,总数约为一万三千余枚。其他 A1 宗间阿玛珍北候官遗址、P9 博罗松治州井候官遗址、A33 地湾肩水候官遗址等均有汉简出土。参见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 年第 1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下)》,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95 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1、2 页。

③ 本文所引居延汉简均出自谢桂华、李均明、朱国超:《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隧》,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此外,额济纳汉简与居延汉简性质相同,亦有引用,见孙家洲主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版。以下不再注出。

④ 迄今为止,对汉代候官进行专门或系统研究的论著主要有:1.永田英正:《试论居延汉简中所见的候官》,《史林》1973 年第 5 号,后收入氏著:《居延汉简研究》,日本同朋舍 1989 年版;永田英正:《再论汉代边郡的候官》,收入氏著:《居延汉简研究》,日本同朋舍 1989 年版;该书中文译本见永田英正著,张学峰译:《居延汉简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2.吴昌廉:《汉简所见之候官组织》,台北《简牍学报》1985 年第 11 期。3.李均明:《汉代甲渠候官规模考(上)》,《文史》第 34 辑,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25~45 页;李均明:《汉代甲渠候官规模考(下)》,《文史》第 35 辑,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81~92 页。4.宋会群、李振宏:《汉代居延甲渠候官部隧考》,《史学月刊》1994 年第 3 期。其他涉及候官某一方面的研究文章数量众多,但总体来看,既有研究成果并未在候官的管理手段和运行机制方面作深入探讨。

单调乏味,但恰恰构成了汉帝国在边郡统治的基调。以甲渠候官为例分析和研究候官的日常管理,无疑可以为深入认识汉代边郡候官的形态和功能,进而研究汉帝国在边郡地区的日常统治提供新的视角。

一 文书掌控

这里所说的“文书掌控”,并不等同于永田英正氏提出的“文书行政”。所谓“文书行政”,是指通过文书向下传达命令、向上汇报工作的行政制度。这种制度肇始于秦代,经汉代继承和改良,到汉武帝时期已臻完善,成为长久维持汉帝国统治的重要手段^①。我们所说的“文书掌控”,是指候官利用文书领导和监督部隧日常工作的一种工作方式,可以说是具体而微的“文书行政”。

在甲渠候官的日常运行之中,文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候官的领导之下,各部的的主要工作是候望和日迹,即查看敌情,根据敌情状况传递不同的烽火信号,为居延屯戍区乃至张掖郡等上级机构提供级别不同的军事预警信息,以使汉政府的统治力量能迅速作出反应。同时,部隧也需要承担大量的作治任务。处在甲渠塞邮路线上的城北、临木、吞远、不侵诸部,还要负责传递邮书^②。记录部隧吏卒“日迹”和“省作”的簿籍文书以及反映部承担邮书传递任务的“邮书课”,这三类文书基本涵盖了部隧吏卒的主要工作,也最能反映甲渠候官在日常管理中是如何运用文书掌控所属部隧的。

1.“日迹簿”中的部隧工作和候官管理

日迹,是指边塞吏卒每日巡查天田和边塞,以判断有无人马踪迹等异常情况的活动。日迹关系到边塞防务和吏卒的生命安全,是部隧吏卒最重要的本职工作^③。正常情况下,甲渠候官所属各部的候长、候史,部之下的隧长、隧卒,均需承担日迹任务^④。日迹的吏卒锄画、整治天田,维护其平整,根据沙地上留下的痕迹判断有无人马出入,借以获知敌情^⑤。

通过要求部按月呈报吏卒的日迹簿籍,甲渠候官可以对部隧的日迹工作进行掌控。下面简文可以提供证明:

(1)元康元年五月乙酉朔丁丑候长安世敢言之谨□四月日迹簿一编敢 E.P.T57:87A

(2)五凤五年二月丁酉朔乙丑甲渠候长福敢言之谨移日迹簿一编敢言之 267·15A

(3)永光四年八月戊申朔丁丑临木候长谨移吏日迹簿一编敢言之 E.P.T48:1

(4)河平三年十月丙戌朔癸丑城北候史章敢言之谨移十月吏卒日迹簿一编敢言之 E.P.T51:207

上列诸简都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查《二十史朔闰表》,简文所载月朔年代在西汉宣帝、元帝、成帝等不同时期。简(1)、(2)为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五凤五年(即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部向候官呈报的日迹记录,其名称为“日迹簿”。简(3)为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部向候官呈报的“吏日迹簿”。简(4)为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部向候官呈报的“吏卒日迹簿”。从简文内容看,这些应当是甲渠候官保存的下属各部按月呈报的日迹文书。呈报时,一般是以候长或候史的名义发出。

从一些簿籍的标题可以看出,部是按月编制日迹簿的。如下简:

(5)·不侵部建始三年四月吏卒日迹簿 EPT51:472

(6)·临木部初元五年六月吏卒日迹簿 EPT59:28

(7)·第十候长寿甘露四年九月迹簿 EPT56:282

(8)·饼庭部建昭元年三月候长候史日迹簿 EPT58:107,92

(9)不侵部黄龙元年六月吏卒日迹簿 139·5

这些简文显示,不同时期,部呈报的日迹簿有“日迹簿”“吏卒日迹簿”“吏日迹簿”“迹簿”等不同名称。

① 永田英正著,王勇华译:《文书行政》,载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3页。

② 本文涉及甲渠候官组织、人员构成、部、隧的隶属关系等部分,采用具有代表性的李均明的观点。参见李均明《汉代甲渠候官规模考(上)》及《汉代甲渠候官规模考(下)》。

③ 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④ 士吏日迹情况,简E.P.F22:167有“令隧长旦蚤迹士吏候长常以日中迹”,但日迹簿中没有看到士吏的日迹记录,可能士吏只是临时派驻某部,所以部日迹簿中缺乏记载。

⑤ 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341页。

简(1)、(2)、(7)、(9)皆为汉宣帝时期简。简(1)、(2)表明部上呈候官的文书叫“日迹簿”，而简(9)的标题是“吏卒日迹簿”。简(3)、(6)为汉元帝时期简，部呈报的有“吏日迹簿”，也有“吏卒日迹簿”。同一帝王年代，部呈报的日迹记录名称却有差别。同时，某些时候候官的要求不同，部需要单独呈报“吏日迹簿”。简(7)、(8)把候长、候史的日迹簿单独列出，应当是候官为了考核候长、候史时统计劳日的方便。根据边塞法令，候长、候史享有日迹赐劳的优待。简 562·19：“北边挈令第四：北边候长、候史迹二日当三日。”如学者所说，赐劳一般一年核实并实施一次，程序是由候官核算赐劳日数，并提请都尉府批准^①。

部制作和上呈的日迹簿，应该包括候长、候史的日迹簿和隧的日迹簿。

其一，候长、候史的日迹簿。

部的候长和候史的日迹活动，是部制作和上呈的日迹簿的一项重要内容。候长、候史的日迹簿记载方式，既可以将候长和候史的日迹合并记录，也可以单独记录，如下简：

(1)候长尊

候史长秋丁未诣官不迹 闰月己卯从当曲隧北界迹南尽不侵隧南界尽丁未积廿九日毋城塞出入迹 E.P.T56:28

四月乙巳日迹积一日毋越塞兰渡天田出入迹

(2)收降候长赏候史充国 乃丙午日出一干时虏可廿余骑萃出块沙中略得迹卒赵盖众

丁未日迹尽甲戌积廿八日毋越塞兰渡天田出入迹 E.P.T58:17

(3)吞远候史李敖之

三月辛亥迹尽丁丑积廿七日从万年隧北界南尽次吞隧南界毋人马兰越塞天田出入迹

三月戊寅送府君至卅并县索关因送御史李卿居延尽庚辰积三日不迹 206·2

(4)……丁未积九日病不迹戊申尽癸丑积六日徙囚甲寅尽己未积五日病不迹 E.P.T51:206

候长、候史日迹簿的内容，包括详细记载从事日迹的时间，日迹的范围（部界之内），有无人员出入塞防天田，有无突发事件等。因公、私事务没有日迹，如赴候官办事、护送上级官员、移送囚徒等情况，在候长、候史的日迹簿上都会逐一记录。候长、候史的日迹簿单独记录，按月积累，最后会制作成候长、候史个人的年度日迹簿，作为申报赐劳的基本依据。如简 E.P.T53:38 的“甲渠候史公乘徐惠倩日迹簿”，该简记录了候史徐惠倩一人的年度日迹情况。该候史从神爵四年（公元前 58 年）二月任职，日迹簿上的统计时间截至该年九月底。李振宏先生指出，这是供年度考核所用的日迹档案^②。

候官戍吏日迹的统计与核算，要求严格。如简 156·35“虚积八日解何甚毋状檄到□”。此简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内容措辞严厉，极有可能是居延都尉府对甲渠候官下达的问责文书。甲渠候官在上报某戍吏的年度日迹簿时，日迹天数虚增了八日，于是都尉府命令严查。可见，候官须对部呈交的日迹簿的真实性负责。甲渠候官通过候长和候史的日迹簿，便可掌握诸部吏员的日迹工作的详情。

其二，隧的日迹簿。

隧作为最小的候望单位，其日迹簿也是像部那样按月制作。有学者认为，隧长或各个隧的日常记录或报告，均由候史做成，最后呈送到候官^③。这种意见的提出，主要是考虑到边塞隧长及隧卒不可能具备识字和书写文书的能力。但从简文看，候望机构的戍卒大多能够诵读烽火品约，隧长等戍吏也多数“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隧向上级呈送文书的情况也并不少见。中央诏令、张掖郡太守命令中，也常要求“明白扁书亭隧显现处令吏卒尽知之”^④。所以，隧大概是有能力制作簿籍文书的。

隧的日迹簿，无疑应该包括隧长和隧卒的日迹活动记录。目前所见隧的日迹簿，有两种形式：一为卒日迹簿；一为隧日迹簿。以隧为单位的“卒日迹簿”，其标题和正文的格式如下：

• 第四隧昭元年七月卒迹簿 E.P.S4.T2:2

① 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第 129～130 页。

② 李振宏：《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6 页。

③ 藤枝晃：《居延汉简研究·序文》，永田英正著，张学锋译：《居延汉简研究》，第 7 页。

④ 如《额济纳汉简》2000ES9SF4:2 简“甲沟候获下部候长等丞〈承〉书从事下当用者明白扁书亭隧显现处令吏卒尽知之”、《合校》简 139·13“书到令长丞候尉明白大扁书乡市里门亭显现”等。

- 第四隧建昭三年八月卒日迹簿 E.P.S4.T2:4
- 第七隧建昭二年十一月卒迹 \square E.P.S4.T2:106
- 第十二隧迹虎月 \square 簿 2002ES12SH1:1

卒吕弘二月壬午迹尽丙申积十五日

第三隧 卒郅安世二月丁酉迹尽庚戌积十四日

卒桥建省治万岁坞

凡迹积廿九日毋人马越塞天田出入迹 214 • 118

七月癸酉卒张垣迹尽丁亥积十五日 七月癸酉卒郭昌省茭

第十七队 七月戊子卒吴信迹尽壬寅积十五日 • 凡迹积卅日毋人马兰越塞天田出入迹 E.P.T51:211

从编号看,上简中三枚标题简皆出土于甲渠候官第四隧,该隧为甲渠候官第四部的所在地。简文年代分别为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从笔迹、墨色看,简文当出于不同人之手。一般来说,如果第四隧、第七隧(属第四部)的日迹簿为第四部候史制作,则当出自三位候史之手。而甲渠候官的戍吏任职一般较为稳定,短短三年之内,第四部不可能连续更换三位候史。那么,第四隧、第七隧的日迹簿为该隧自行制作的可能性很大。而简2002ES12SH1:1中第十二隧的“迹虎月 \square 簿”,应当属于该隧某月的“日迹簿”。从编号看,该簿出土于第十二隧遗址,为隧自行制作隧的“日迹簿”提供了旁证。

隧日迹簿,是将隧长、隧卒合并,记录整个隧的日迹情况。如:

- (1)第十六隧长王 $\square\square$ 乙巳王散迹 \angle 壬子王延迹 \angle
 戊卒王延 丙午王延迹 癸丑王散迹 \angle
 戊卒王散 丁未陈乐成迹 甲寅陈乐成迹 \square
 戊卒陈乐 \square 戊申王散迹 \angle 乙卯王延迹
 卒王延省 乙酉王延迹 E.P.T56:290

(2)第四隧长……陈常利迹

卒陈……郭戊迹

\square 戊 267 • 21

简(1)反映的是第十六隧的日迹情况。“第十六隧长王 $\square\square$ ”,两字不识,缺少的字应与隧长名字和日迹有关。从内容和格式上看,简(2)中第四隧的日迹簿应当与第十六隧形式相同。部负责制作文书的候史,综合各隧提交的日迹簿,最终制作部日迹簿,以候长(或候史)的名义,每月月末或下月初按时向甲渠候官呈报^①。

上述甲渠候官各部日迹簿的制作和呈送过程,反映了边塞屯戍区文书管理制度的严密和严格。甲渠候官正是通过这种文书管理方式,将常态化的日迹工作纳入其严密管控之下。日迹簿按月呈报看似单调而重复,实则蕴含着边塞候望机构行政运作的稳定与理性。甲渠候官及其下属的职责是“日迹、候望、通烽火、备盗贼”,年复一年,单调乏味。只有遇到特殊情况如胡虏入侵、反羌猖獗等,个别吏卒方可根据“捕斩匈奴虏反羌购赏科别”等边塞法令^②,因捕获杀敌等重大军功,得到越等升迁机会。正常情况下,大多吏卒就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工作中,依靠日积月累形成的劳绩,获得“以功次迁”的微小秩级提升。对担任候望任务的部隧戍吏而言,日迹簿是他们参加甲渠候官年度性考核的基本依据。通过这样的考核,他们一年的辛劳有可能得到候官乃至都尉府等上级机构的肯定,因而有可能获得薪酬、待遇以及生活条件的改善。

2.“作簿”里的部隧工作和候官管理

如上文所述,部向候官呈报的日迹簿的内容是以部隧的日迹为中心。如果仔细观察,还可以看到某些吏卒因公私事务“不迹”时,在日迹簿上也会留下记录。如日迹簿注明了吏卒因疾病、省作、公务等离岗不迹的情况。可见,日迹簿的记录也涉及候官其他的日常工作。从简牍材料看,部隧吏卒有时

① 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第129页。

② 张忠炜:《额简“购赏科条”再研究——以居延简“购赏科别”册书复原及相关问题研究为中心》,载孙家洲主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第249~261页。

还要承担大量的作治任务,诸如:营建修治烽隧亭郭设施、伐茭积蓄畜草、治炭治薪、载运粮谷等等^①。这些作治任务,最后也要计入部隧吏卒的劳绩中去。

甲渠候官对部隧吏卒从事的日常作治等勤务性工作,是用“作簿”的形式进行管理和掌控的。日迹簿对这些工作的简要记录与“作簿”的详细记录,构成了不同文书互相比勘校对、掌控吏卒工作状态的严密网络。记载郭卒和省卒杂务性劳作的“作簿”有时也称“日作簿”。一般说来,简文所记吏卒到甲渠候官之外的处所从事“省作”,是在居延都尉府统一安排调度下进行的。甲渠候官会根据所属部隧的情况,有区别、有选择地从各部隧抽调戍卒,奔赴都尉府规定的作治地点开展工作。如下简:

□月……当曲隧以南尽临木道上行书不省

□十六隧卒二百□□ • 右部隧十八所卒六十三人不省

列隧□□及承隧五十八所=三人今省所一人为五十八人斋衣装作旦诣殄北发郭

除僵落沙会八月旦 99ES17SH1:7

阳朔元年三月乙亥第十候长博谓第十六隧长良府调卒隧一人诣殄北除沙

常〈当〉会月

□□行者走 第十隧卒王如意第十一隧卒杨耐第十二隧卒王□等三人诣殄北□□

十七隧长谭以撒言付谭日时良趣急县索令会旦已候长 99ES16SF3:1ABC

上简分别出土于甲渠候官第十六、十七隧,说明了甲渠候官遵从都尉府命令,征调戍卒赴殄北候官省作的情况。殄北候官和甲渠候官这种跨候官间的人员调动,应是在二者共同的上级居延都尉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简 99ES16SF3:1 说明,第十部接到甲渠候官征调戍卒的命令后,从下属第十、十一等隧抽调戍卒赴殄北候官省作。可以想象,当这些从第十部抽调出来的隧卒离开原来的岗位去殄北省作时,他们该月的日迹簿一定会像简 285·1 那样注明其省作的情况:

次吞隧 卒鲁侯外人九月甲午迹尽庚申积廿七日 省殄北

卒憑常鲁当时寿乐九月甲午迹尽癸亥 积卅日 285·1

征调吏卒省作的时候,甲渠候官会对各部隧的作治工作进行管理,即要求部在有作治任务的月份逐日记录吏卒的工作情况。烽隧的吏卒如果在所属部之内从事作治任务,则由该部的候史制作“作簿”进行记录。如果由候官统一抽调吏卒到部之外从事省作,则应由甲渠候官统一制作作簿。如学者所说,各部制作的“作簿”,需按月上报候官^②。部制作的“作簿”,其标题简如下:

• 第十一部建始二年五月负卒日作簿 113·3

• □远部建始二年闰月省卒日作簿 E.P.T51:115

两简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是建始二年(公元前 31 年)甲渠候官下属第十一部、[吞]远部制作的作簿。负作,即背负,指戍卒依靠人力运输某种物资^③。作簿的正文和内容如下:

其一人养 四人治堠涂

(1)正月十一日辛巳卒十三人 四人诣官廩

四人运水 定作十三人 E.P.T65:268

(2)己卯卒十人 一人养 六人伐兹其

定作九人 三人绳得绳百一十丈合百八十丈 E.P.T52:29

(3)第廿二隧卒司马忠 治塹八十 治塹八十 治塹八十 除土除 27·8

(4)第五隧卒高登治塹□□ 治塹八十 治塹八十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27·12

上列诸简皆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反映不同日期戍卒的省作情况。“养”,指为省卒做饭。“治堠涂”,指用草泥、白灰粉刷烽隧墙壁^④。“治屋”,指修治房屋。“伐兹其”指砍伐、割治兹其用作牲口草料等。作簿反映了部隧卒省作时的分工、工作量等情况。简(1)中“诣官廩”说明,当日有戍卒赴甲渠候官领取口粮。其作治的人数大大超过了一个隧的吏卒总数,可以确定是属于部制作的作簿。简(2)可能是部制作的作簿。因为甲渠候官所属各部下辖烽隧 6 至 8 所不等,每隧一般有三四人。如简 E.P.S4.

① 关于河西汉塞吏卒的日常工,见赵宠亮:《行役戍备——河西汉塞吏卒的屯戍生活》,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89~94 页。

②③ 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第 134 页。

④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附录部分《敦煌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发掘报告》,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52 页。

T2:34“第四部省卒隧一人”，每隧只抽调一二人省作，方能保证部隧候望工作的正常进行。因此，部之内抽调戍卒最多以十人左右为宜。简(3)、(4)编号相连，字迹墨色相同，当属同一简册，分别反映的是第十七部廿二隧、第四部第五隧的省作情况，可见，该简册是由这两部的上级甲渠候官所做。简册列出隧卒名，并记录连续数天之内的作治情况。这应是作簿较统一的制作方式。

部在承担作治任务时应按时制成作簿，并呈报给甲渠候官。简牍资料中虽然没有完整的呈报简文，但部制作好的作簿，应当像日迹簿一样，以候长、候史的名义在完成作治任务后的当月或下月之初移送候官。甲渠候官通过部按时呈报的作簿，可以详细掌握除了日迹候望工作之外部所承担的作治任务执行情况。

3. 邮书课和候官管理

甲渠塞的“河南道上塞”即自北向南的不侵、吞远、城北、临木四部境内，有居延屯戍区的南北邮路穿过。这四部在日迹候望的同时，还担负着大量的邮书传递任务。与甲渠“河北道上塞”的万岁、第四等部相比，“河南道上塞”各部的作治任务较少。如简 99ES17SH1:7“当曲隧以南尽临木道上行书不省”所示，甲渠候官考虑到文书传递工作的需要，有意减省了这几个部的省作任务。而对部传递邮书的工作，甲渠候官也将其纳入文书掌控的范围。

汉政府对公文的传送有严格的规定，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行书律》：“邮人行书，一日一夜行二百里。不中程半日，笞五十；过半日至盈一日，笞百；过一日，罚金二两。邮吏居界过书，弗过而留之，半日以上，罚金一两。”^①正常情况下，承担邮书传递任务的各部，必须按照甲渠候官的要求，保证邮书在部界之中准确传递。同时，部和相关的隧除了派人传递之外，还要制作详细的“邮书课”（或“邮书刺”）^②。陈梦家指出，邮书课当指专门记载邮书往来的簿录，其内容包括：南书或北书，邮书性质，封数及其装束，发文者的封泥印章，所诣即收文者，传授的邮站及其吏卒姓名，邮站收发时刻，规定的里程及时程，传送的方法等^③。邮路之上的部需要按时向候官呈报邮书课，汇报部界之内的邮书传递情况。如：

(1) 元延四年九月戊寅朔戊寅不侵候□谨移八月邮书课一编敢言之 E.P.T40:147A

(2) 建始二年十二月甲寅朔甲寅临木候长宪敢言之谨移邮书课一编敢言之 E.P.T51:264

这两条呈报简文均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简(1)，不侵部候长（或候史）在九月初一向候官呈报八月份的邮书课。简(2)，临木候长十二月初一向候官呈报上月邮书课。这说明，不侵、临木等部在下月月初向候官呈报上个月的邮书课。

部向候官呈报的邮书课，其标题简如下：

(3) 临木部建武八年闰月邮书课 E.P.T20:2

(4) □□部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三年二月 邮书课 110·19

两简皆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查《二十史朔闰表》，建武八年(32年)闰六月，简(3)应该是建武八年七月临木部向候官呈报的邮书课。而简(4)则是地皇三年(22年)二月某部呈报的邮书课。邮书课的正文当如下：

(5) 南书二封皆都尉章·诣张掖大守府·甲校

六月戊申夜大半三分执胡卒常受不侵卒乐

己酉平旦一分付诚北卒良 49·22,185·3

(6) 南书一封居延都尉章 诣张掖大守府

三月庚午日出三分吞远卒赐受不侵卒

受王食时五分诚北卒胸 E.P.T51:14

(7) ·右南书六封 E.P.W:90

(8) ·右南书十三封 E.P.T52:764

①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

② 邮书课和邮书刺的内容似乎大致相同，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分析或推断这两种文书的差异。

③ 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页。

(9)北书三封合檄板檄各一

其三封板檄张掖太守章诣府 九月庚午下铺七分临木卒副受州并卒弘鸡鸣时当曲

合檄牛骏印诣张掖太守府牛掾在所 卒昌付收降卒福界中九十五里定行八时三分疾程一时二分

157·14^①

上列诸简,永田英正提出,从北边的居延都尉府向南边肩水都尉府、张掖太守府等地传递的南行邮书,称南书;从南边张掖郡、肩水都尉府等地向居延都尉府传递的北行邮书,称为北书^②。从简(5)看,不侵、城北都是隧名。吞远部执胡隧卒先从不侵部不侵隧卒那里接受邮书,然后又交给城北部城北隧卒,应当是在吞远部执胡隧做成的邮书传递交接记录。同样道理,简(6)应当是吞远部吞远隧做成的邮书传递与交接记录。这样的记录,也就是由隧制作的邮书课:

□酉临木隧长忠敢言之谨移邮书□ 127·29

临木隧建始二年二月邮书刺 E.P.T51:391

建昭五年三月临木隧邮书课 145·34

简牍中以隧为单位制作的邮书课,仅见于临木隧的邮书课。按照情理,承担邮书传递的其他隧也应当会制作邮书课。由简(5)、(6)可知,吞远部的邮书课,应该是以该部执胡隧、吞远隧等传递邮书的隧制作的本隧卒接受和交付邮书的记录。简(7)、(8),“右南书六封”“右南书十三封”这样的右类简文,则是对南行、北行邮书的分类登记。部每月向甲渠候官呈报邮书课时,这样的分类统计汇报是必不可少的。

值得注意的是,甲渠候官不仅要求部按时上报邮书课,而且还要对邮书课一一检查核对。简(5)上的“甲校”以及邮书课简 49.33 上的“七乙”、简 132.27 上的“中已”,墨色和笔迹均与简文不同。永田氏认为其用意不明^③。实际上这可能是甲渠候官对邮书课内容进行检查或核对时用过的文字或符号。记录是否准确无误,邮书传递交接手续是否完备,传送时间是否“中程”,甲渠候官的负责戍吏在检核后,都应写上相应的文字或符号。简文可见:

• 校临木十一月邮书一 □ 78·8

• 校临木邮书三封 □ 224·5

□校临木邮书一封 十一月己未夜半当曲卒同受收降卒严下铺临木卒禄付诚势北隧卒则 203·2

三简均出自甲渠候官遗址,临木当指临木部(或临木隧)。简文中的“校邮书”当指查验邮书的交接人员和时间等关键信息。甲渠候官对每日通行于部界之内的邮书课进行查验,既是为了避免邮书传递迟误而被都尉府等上级机构追查失职责任,又是为了加强对部隧的日常工作管理。如下简:

建昭四年四月辛巳期庚戌不侵候长齐敢言之官移府所移邮书课举曰各推辟部中牒别言会月廿七日·谨推辟案

过书刺正月乙亥人定七分不侵卒武受万年卒盖夜大半三分付当曲卒山鸡鸣五分付居延收降亭卒世 E.P.T52:83

据简文可知,居延都尉府传告甲渠候官,追查某次邮书传递出现过失的吏卒责任。甲渠候官随即移文不侵部,追查邮书在该部的传递经过。不侵部查明真实情况后详细呈报候官。根据推究的结果,甲渠候官可以权衡处置。有时这类追查邮书传递迟误情况的简文,还附有相关惩处标准的法律条文,如:

官去府七十里书一日一夜当行百六十里书积二日少半日乃到解何书到各推辟界中

必得事案到如律令言会月廿六日会月廿四日 E.P.S4.T2:8A

不中程百里罚金半两过百里至二百里一两过二百里二两

不中程车一里夺吏主者劳各一日二里夺令□各一日 E.P.S4.T2:8B

简背面所载,是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行书律》性质相同的律令内容。这种律文出现在候官追查下属吏卒行书失职的文书中,无疑将产生很大的警示作用。对邮书传递失期的惩罚,除了上文引述的“罚金”之外,还有“谪载”,如简 E.P.T59:96 的“□坐闰月乙卯官移府行事檄留迟三时九分不以马行适

① 简文根据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释文做了调整,参见邢义田:《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487、489 页。

②③ 永田英正著,张学锋译:《居延汉简研究》,第 82、83 页。

为戍卒城仓转一两”。“适”，通“谪”，是指汉代对有失职行为的官吏的劳役性惩罚^①。简文表明，甲渠候官某位戍吏在传递都尉府行事檄时稽留迟误，被处罚到居延城仓转运粮食。可见，甲渠候官对部隧邮书传递工作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以上的论述表明，日迹簿、作簿、邮书课这三类文书，将部隧的日迹候望、勤务活动、邮书传递三类重要工作以逐日、逐月的方式清晰地呈现在甲渠候官的戍吏面前。候官及其上级机构利用这些簿籍文书，掌控并监督每一个部隧吏卒的工作状态，有效地维护着候望机构的正常运行。

二 行 塞

行塞，是秦汉时期行政巡视制度在边郡地区的贯彻和实施。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在秦汉时期已经确立和完善了自上而下的行政巡视制度^②。汉代边郡地区的屯戍机构承担着维护国防安全重任，其行塞多是围绕着边塞的军政事务展开的。

行塞，亦可称为“行障塞”。《汉书·高帝纪》张晏注：“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长、丞会都试，课殿最……边郡将万骑行障塞。”^③说明汉边郡太守、都尉等长吏循行障塞、考课吏卒，已经成为制度。简牍材料表明，郡守和都尉的属曹都史、都盗贼、都烽掾等吏及司马、千人等属官，都可代表太守或都尉行塞。行塞时如发现下级的工作中存在弊端，会制成“举书”警告。这类视察通常越级进行，行塞官员亲临基层进行检查，事后会将检查出来的问题通报候官等中层机构，并责令其检讨和整改^④。

行塞是汉代边郡屯戍区行政运行的重要手段，在甲渠候官的日常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 甲渠候官的行塞活动

相对于中央政府部门和郡守、都尉及其属官的行塞，甲渠塞各级戍吏的行塞是经常性的工作。作为汉代边郡屯戍管理的重要内容，行塞的目的是检查边塞的防务活动。检查的范围较广，包括人员在岗与否，兵器及守御器具、烽火器具的完损情况等。甲渠候官各级戍吏的行塞活动，见以下简文：

甲渠障候汉强敢言之谨移四月行塞临赋吏三月奉秩别用钱簿一编 E.P.T56;6A

大守君当以七月行塞候尉循行课马齿五岁至十二岁 E.P.S4.T2;6

府告居延甲渠卅并珍北障候方有警备记到数循行教 E.P.F22;459

独从卅井道不相逢今周掾行塞急 E.P.T65;305A

坐候史齐行塞官弩二次肩候□□□□部□调少□塞□

坐令史奉光行塞弩三次肩候□□ 14·6,213·21

月尉史殷行塞举 285·4

五月癸巳甲渠障候喜告尉谓第七部士吏候长等写移檄到士吏候长候史循行

159·17,283·46

第廿三隧长忠行塞还诣官正月戊寅蚤食入 257·31

上列诸简中，简 14·6,213·21 出土于地湾肩水候官遗址。其反映候史、令史的行塞情况，可与甲渠候官互补。其他简均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这些简文说明，甲渠候官的郭候、塞尉和属吏掾、令史、尉史以及部的士吏、候长、候史、隧长等都负有行塞的责任。其中，郭候作为甲渠候官的行政长官，因为级别高，其行塞自然显得更为重要，值得专门研究。

郭候作为边郡屯戍机构的中层官员，其行塞活动应当较为频繁。郭候行塞，可能出自各种原因。例如，因上级机构的周期性行塞和不定期行塞，郭候有必要提前行塞以做好准备。不难想象，皇帝使者、丞相、御史及两府属官，将军、张掖郡守和居延都尉，这些具有绝对权威的上级官吏每一次巡行居延屯戍区，都会引起甲渠候官的高度重视。甲渠候官势必会事先至部隧进行细致检查，以期避免因工作失误和疏漏而受到上级惩罚。如简 E.P.S4.T2;6 的“大守君当以七月行塞，候、尉循行，课马齿五岁

① 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简牍集成》第六册，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80 页。

② 刘太祥：《试论秦汉行政巡视制度》，《郑州大学学报》2004 年第 5 期。

③ 《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74 页。

④ 均和、刘军：《汉简举书与行塞考》，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简牍学研究》第 2 辑，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9～154 页。

至十二岁”。张掖太守七月份行塞之前,甲渠候、尉即需提前巡视部隧,检查马匹畜龄等情况。可见,甲渠候官特别是甲渠候在上级举行重要行塞活动之前,一定会提前到部隧进行视察。

按照汉代的行政规定,在胡虏活动猖獗、军情紧急的情况下,甲渠障候应按照上级的命令巡行诸部,亲自指挥部隧吏卒做好防御工作。如 E.P.F22:459 的“府告居延、甲渠、卅井、殄北障候,方有警备,记到,数循行,教勅吏卒,明烽火,谨候望。有所闻见,亟言。有教”。此简为居延都尉府的命令文书。居延屯戍区诸侯官在遇到敌情时,郭候必须按照都尉府规定循行部隧,飭令吏卒熟习并正确传递烽火信号,谨慎候望。此外,作为部隧的直接上级,甲渠候官特别是甲渠郭候负有领导责任,定期或不定期到部隧指导和检查工作,应当是郭候日常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2. 郭候的行塞时间及离署安排

从现存简文看,郭候的行塞日期似乎并不固定。下例简文所载甲渠候具体的行塞情况可以提供证明:

(1) 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辛巳,甲渠障候汉强敢言之。谨移四月行塞临赋吏三月奉秩别用钱簿一编,敢言之。E.P.T56:6AB

(2) 建始五年三月辛丑朔庚申……四候长嘉,候行塞□□兼…… E.P.T51:215

(3) 永光四年闰月丙子朔戊戌甲渠障候□行塞,书到,强行候事真□ E.P.T11:2

(4) □四月君行塞举 168·6

(5) 新始建国地皇上戊四年八月候行塞起居 E.P.F22:336

(6) ·甲渠候官初元五年七月□行塞举 311·3

这几枚简皆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简(4)“君行塞”的君,似是甲渠候官吏卒对障候的敬称^①。据此可知,甲渠候在不同年份的行塞时间有三月、四月、八月、闰十二月^②等。简(6)“□”字不释,似为“候”字。若是,则障候也有七月行塞的情况。

根据汉代行政制度,甲渠候离开候官郭循行各部,需要临时指派下级戍吏“兼行候事”,代行处理候官日常事务。如简 E.P.T51:215 所示,障候行塞时指派候长等人代行候职。另外,代行候职的还有塞尉、士吏、隧长等,如 E.P.F22:45A“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73EJT21:42“肩水候房以私印行事谓士吏平候行塞书到平行”^③、简 264·1“敞行塞谓第七隧长由兼行候事”。结合简文,甲渠候临时指派“兼行候事”的塞尉、士吏、候长、隧长等人,皆为武职戍吏。而像掾、令史、尉史等常驻守候官障的文职戍吏,没有一例“兼行候事”的情况。由此可见,汉代边郡候官之内,代行候职的戍吏应有明确的身份限制,仅限于武职戍吏。

对于“行候事”戍吏的身份问题,侯旭东先生指出,候在选择戍吏代理候职时,被选中充任代理的官吏都应是候的亲信,指派戍吏代理候职与戍吏结束代理之职时,甲渠候官也要以文书周知各下属机构^④,以保证候官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

3. 郭候的巡视目标

作为甲渠候官的首长,候的行塞活动,是从上到下直接的现场监察。简文中有地皇四年(23年)甲渠候行塞的资料,可以用来观察甲渠候巡视部隧检查的目标和内容。据简 E.P.F22:336“新始建国地皇上戊四年八月候行塞起居”,地皇四年八月甲渠候行塞。同时,简 E.P.F22:334 有“新始建国地皇上戊四年泰月己卯朔乙巳甲沟守候阳敢言”、E.P.F22:380 有“新始建国地皇上戊四年八月己酉朔戊辰甲沟守候阳谓”,比较可知,行塞的甲渠候名叫“阳”。甲渠候阳此次行塞的目的,可能是按照地皇四年的“行塞省兵物录”的要求监督和检查部隧工作。“行塞省兵物录”的内容如下:

• 新始建国地皇上戊四年七月行塞省兵物录

① 如简 85·24“甲渠候任君”、简 229·1、229·2“甲渠候杨君”等等。

② 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179 页。

③ 根据辞例,简 73EJT21:42 中“平行”后应为“候事”。该简出土于肩水金关,士吏代行候职的情况当与甲渠候官相同。

④ 侯旭东:《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简牍学研究》第 5 辑,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0、191 页。

省候长鞍马追逐具吏卒皆知烽火品约不 E.P.F22:237

省蓬干鹿卢索完坚调利候卒有席荐不 E.P.F22:238

省守御具坞户调利有狗不 E.P.F22:239

□不 E.P.F22:240

■右省兵物录 E.P.F22:236 E.P.F22:241

上列诸简编号相连,墨色一致,字迹相同,内容紧密相关,同出于甲渠候官遗址,属于同一简册。如标题简所示,简册名应为“新始建国地皇上戊四年七月行塞省兵物录”。省,视察,巡视之意。《汉书·晁错传》:“此将不省兵之故也。”颜师古注:“省,视也。”简文反映了行塞检查的基本内容,如:检查候长的乘马、鞍辔及追逐盗贼器物的配置是否齐备,吏卒是否熟知烽火品约;检查悬挂烽表、烽火的器物是否结实牢固、使用灵活;候望戍卒是否有席子可用;检查守御器具是否整治停当,坞舍的门户是否使用正常,是否蓄养了用于御敌示警的狗等。这份简册制作的时间与甲渠候阳八月行塞的时间仅仅相差一月,所载条文与甲渠候阳行塞时需要视察的目标基本一致。

有学者认为,“行塞省兵物录”为中央使者行塞检查兵器、守御装备的条目要点^①。甲渠候行塞时的制度依据,应该与“行塞省兵物录”类似。还有一些与此相关的简文:

省兵物及簿署□□任用否 E.P.F22:403

行塞举如牒候长候史追逐什器亭隧守御具常设备今或毋或不 99ES16SF5:1

二年秋行塞□□□□及上积薪毋足是署吏被兵簿多缪误蓬表白 73EJT23:280^②

行塞时除“省兵物”之外,还需要检查吏被兵簿等文书。简 99ES16SF5:1 据编号出土于甲渠候官第十六隧遗址,“候长候史追逐什器亭隧守御具常设备”与以上“行塞省兵物录”中的“省候长鞍马追逐具”等条文联系紧密。简文说明,行塞的官吏会依据“行塞省兵物录”那样的行政规范逐条对照,以检查监督部隧的工作情形。

4. 郭候的行塞过程

其一,根据“行塞省兵物录”等法令规定,检查兵物器具及相关设施,检查候长、候史、隧长、戍卒等人员的工作情况,并据检查结果制成举书。

甲渠候行塞时,以部作为单位责任区,以候长、候史为直接责任人,进行检查和监督。在“行塞省兵物录”里,候长、候史的“鞍马追逐器物”是必须检查的内容。而简 E.P.F22:403 和简 73EJT23:280 提到的“省兵物及簿”“吏被兵簿”,这些在行塞时需要查对簿籍文书,并核对原物。有名的“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③,反映的内容可以与地皇四年“行塞省兵物录”对比。该檄书中都吏行塞举书所列广德负责之部存在的问题,诸如烽火器具及设施的养护情况,守御器具是否完备等,都属于“行塞省兵物录”的检查范围。甲渠候阳以及其他戍吏以部为单位行塞时,检查的内容大体上与檄书所列相同,并分别将部隧及其负责人存在的问题以举书的形式记录下来。

候官戍吏行塞的完整举书迄今没有见到,但有些以隧为单位的行塞记录可以提供线索。如:

(1)蓬干□置毋盖·卅一隧卒商□毋采十六月·第廿六隧长王禹□一曲完缮·第廿二隧卒杨□ 104·42A

□积薪东顷丨十四隧长房井坞上北面新伤不补 104·42B

(2)竟,卒三人一人病,卒符恽月廿三日病伤汗二人见,卒范前不知蓬火品 46·9

(3)甲渠临木隧长□。卒郑凤代茭,见二人,同,候仓。六石赤耳具弩三完婴缓衣弦□解弩一文中布不札□

大下——,五石赤胄具弩一完婴缓衣弦解 89·21

简(1),列举了鉞庭部第三十一隧、第廿三部第廿六隧、第十七部第廿二隧、第十部第十四隧诸部隧存在的各种问题。该简可能是甲渠候等戍吏巡视甲渠塞后的记录。简(2)、(3),涉及隧卒是否在署及其活动情况。一般来说,行塞官员应当完全掌握吏卒的活动情况。戍卒或因伐茭,或因生病等情况离开烽隧,往往要在行塞的举书中注明。行塞官员如果发现吏卒“不在署”即离开了岗位,则需要进行追查

① 中国简牍集成编委会编:《中国简牍集成》第十二册,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1 页。

②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二)》,中西书局 2012 年版,第 147 页。

③ 甘肃居延汉简整理小组:《居延汉简“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文物》1979 年第 1 期。

和验问。如：

(4)第十五隧长王赏不在署，廿八日出 206·27

(5)吞远隧卒贾良不在署，谨验问，吞远候长谭、兼候史吞北隧长褒，辞曰十二月五日 E.P.T59:69

上述简文，主要涉及候官行塞戍吏对部隧吏卒离岗情况的调查验问。因为边塞制度对吏卒离开岗位的情况有严格的处罚规定，一般情况下，部隧的当值吏卒面临即将到来的上级行塞时，往往会肃然自警，不敢懈怠。如简 495·4 有：

彭今年毋状小疾，内钱，家室分离独居困致，毋礼物至子侯君□前，甚毋状。独赐膺贺初岁，宜当奔走至前，迫有行塞者未敢去署，叩头请候问

此简内容属于戍卒(或低级戍吏)彭致子侯(或地位较彭高的戍吏)的私人书信。彭说自己因为受到子侯的关照，理应先去向子侯表示感谢，可是迫于上级戍吏行塞，不敢私自离开署所。

其二，对候望单位进行考评，并做出相应处罚。

边塞官吏对候望机构的行塞检查，一般会涉及对部隧工作的评价。简中有名的“宣与幼孙少妇书”中，都吏致信候长幼孙说：“书即日起候官，行兵使者幸未到，愿豫自辩，毋为诸部殿。”即是劝诫幼孙提前做好所部工作，免得在行塞使者考核时成为成绩最差者^①。甲渠候阳，或者其他候官戍吏行塞时，会根据部隧出现的情况，对负责的戍吏进行考评，确定部隧工作优劣。如：

(1)第卅四队范尚。六石具弩一……乡承弦一绝靡负五算，囊矢矢铜鍪六斥呼二差折负八算，鼙矢铜鍪二差补不事用二斥呼二羽币负十六算，兰一负索币负一算，靳干一斥呼负一算，□□□毋□负一算，心腹止泄药非物负一算；第四隧 E.P.T50:2

(2)次吞隧长长舒。卒四人，一人省，一人车父在官已见，二人见。堠户厌破不事用负二算，木长接二柄长负二算，直上蓬干柱柜木一解随负三算，堠坞不涂堠负十六算，反苛一币负二算，天田埒八十步不涂不负一，县索三行一里卅六步币绝不易负十算，积薪梁皆不堠负八算，县索缓一里负三算·凡负卅四算 E.P.T59:6

简(1)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列举了第卅四隧诸项检查结果，还有第四隧的记录。第卅四隧属于鉞庭部，第四隧属于第四部。这样的跨部记录，当是甲渠候或候官派出戍吏的行塞结果。简(2)列出了对次吞隧的行塞考评结果。其中“一人车父在官已见”，表明行塞的候官戍吏已经在候官郭看到了这名充当车夫的戍卒。候及戍吏行塞时，以“行塞省兵物录”等行政规章或律令文书作为凭借，用“算”作为计量单位，对基层候望单位进行评价。工作优异得算，不合格者负算^②。最后统计得负算的基本情况，作为部、隧责任人工作成绩的评定依据。

从简中反映的行塞活动看，行塞官吏会综合各部隧的评价结果，评出优劣等差。上述详细的检查记录和负算统计，正是甲渠候等行塞戍吏对部隧负责的戍吏执行奖惩的前奏。如：

(3)更秩蓬解随销纽不以时着忠当坐废□113·28

(4)呼不涂治，案：严软弱不任候望吏 E.P.T48:8

(5)□里上造张熹、万岁候长居延沙阴里上造郭期，不知犍烽火兵弩不繁持，熹□□□斥免它如爱书敢言之 E.P.T59:162

(6)长张褒坐去署，候长乐博候史李宗部主允 261·43

上述数简，反映了对烽隧戍吏失职行为进行处罚的情况。简(3)~(6)，皆是某部隧戍吏因工作疏失、离开署所等情况，而遭受免职等不同程度的惩罚。

依照惯例，被查出工作疏失的部及烽隧需要及时采取措施，使诸项工作走上正常轨道。如：

(7)第十五隧长李严。铁鞮督二，中毋絮，今已装；五石弩一，左强三分，今已亨；铁铠二，中毋絮，今已装；囊矢十二，干斥呼未能会，会 3·26

(8)第五隧长赵延年。有方二破斧头一破·皆已易；蓬索一币·已易 112·23

(9)□囊矢二，羽币补不事用，已作治成□鼙矢十，羽币补不事用，已作治成 58·3

(10)第七隧长徐谭。候楼毋屏已作治成 E.P.T.59:41

① 马怡：《居延简〈宣与幼孙少妇书〉——汉代边吏的私人通信》，《南都学坛》2010年第3期。殿，指考课最后一名。

② 于振波：《汉简“得算”“负算”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331页。

上述诸简与行塞举书格式相近,内容反映部隧针对上级行塞举书指出的问题及时整改的情形。简(7)说,第十五隧无丝絮作衬的铁盔甲已填充完好,弩弓得到矫正,松弛的弓弦也得到更换,破裂的箭杆得到矫治弥合^①。总之,针对举书指出的问题,隧长李严负责的第十五隧已进行妥善处理。简(8),隧长赵延年负责的第五隧,对兵器及升挂烽火的绳索等存在的问题,均已得到解决。简(9)、(10)的“已作治成”表明,行塞举书列出的问题均已解决。

上述考证已经表明,甲渠障候等行塞戍吏深入诸部隧实地掌握部隧工作现状,检查并督导部隧工作。亲临一线督导工作的管理方式,避免了文书管理容易流于形式的弱点。

三 召 会

召会制度是汉代行政制度的重要内容。李均明指出,召、会是居延汉简最常见的行政用语。《汉书·陈胜项籍传》:“号召三老豪杰会计事。”《汉书·苏建传》:“单于召会武官属。”行政实践中的召会,主要用于限定办事的时间与空间,是实现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汉代人亦称之为“期会”^②。

甲渠候官的日常管理之中,召会也是一种重要的行政手段。在汉简中,经常可以看到甲渠候官的部隧吏卒要“诣官”办事。其中不少例子,是吏卒接受候长的召会而到候官,即所谓“召诣官”。永田英正认为,涉及“召诣官”的简文,带有“会月廿一日”“会月十六日”这种文句的书檄,是为了下达举行集议的命令^③。永田氏可能是误将“会”当作“集会”或“集议”。李均明已经指出,“会”的含义是会面或会合。新旧居延汉简、额济纳汉简中有不少“召诣官”简文,为我们分析甲渠候官运用召会手段管理部隧日常工作提供了充分的材料支持。

其一,候官针对部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檄书、记等形式传召有关吏卒在规定时间内前来接受验问。下列“召诣官”简文,都是候官因发现部隧的工作存在某些问题,而通知相关吏卒前来汇报:

(1)官告候长辅上,记到辅上驰诣官,会铺时,辅上行与廿一卒满之诣官,欲有所验,毋以它为解,第十七候长辅上,故行 E.P.T56:88AB

(2)九月癸亥,官告第十七候史,为官买羊,至今不来,解何。记到,辄持羊诣官,会今,毋后都吏……
2000ES7SF1:16

(3)邮书失期前檄召候长敞诣官对状 123·55

(4)候长不相与邸校而令不相应,解何。檄到驰持事诣官,须言府 E.P.F22:454

上列简文都是以檄书、记的形式要求下级戍吏前往候官。檄,即檄文、檄书,用于在紧急情况下传递消息或下达指示;还可用作上级机构召见下级的通知。记,是较书、檄随意的通行文书,用于传达上级官吏的个人命令^④。简(1)中,甲渠候官为了验对某种情实,以檄书传召候长辅上骑马速至候官接受验问。简(2)是候官用“记”传召为候官买羊延期不至的第十七部候史,责令他到候官复命。简(3),候官用檄书召会候长敞赴候官以配合调查邮书失期问题。简(4),可能是部呈交候官的簿籍文书出现差错,候官紧急传召候长某赴候官核对。候官的召会通知,有时如简(1)会特别注明,“毋以它为解”,下级戍吏不能以其他理由推脱。命令文书上的“会铺时”、“会今”等,规定了到达候官的严格时限。根据情势,候官可以要求下级吏卒“驰诣官”“以急疾为故”,以最快的方式奔赴上级机构,处理要务。

其二,候官为部署某种临时性任务,传召部隧吏卒前来领命。候官的召会命令涉及部吏卒的公私事务,范围广泛。如:

① 鞬督,即鞬整,胄,头盔。斥呼,即斥呼,裂开之意(参见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第96页)。“干斥呼未能会,会”,会,有两义与之相关。一,释为对合。《尔雅·释诂上》:“故合盖翕仇偶妃匹会,合也。”郭璞注:“皆为对合也。”《诗经·卫风·淇奥》:“会弁如星。”马端临《传笺通释》注:“凡两缝相合处为会,弁缝谓之会,犹墙隙谓之壁会也。”结合简文,应为箭杆破裂,缝隙不能对合,经过整治已对合。羽币,指箭杆尾端的羽毛损坏。

② 李均明:《居延汉简召会考》,载氏著:《简牍法制论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页。

③ 永田英正:《试论居延汉简中所见的候官》,载永田英正著,张学锋译:《居延汉简研究》,第384页。

④ 李均明:《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265页。

(5)建武五年二月丙午朔甲戌,掾谭召万岁候长宪诣官,先以证不言请,辞已,定满三 E.P.F22:288

(6)官并司马君,都吏郑卿、督蓬史周卿行塞,即日宿吞远,具吏卒

2000ES7SF1:6A

省卒赵宣伐财用。檄到,召官母后司马都吏 2000ES7SF1:6B

(7)长宪行事封移居延已召候长当持劾算诣官 E.P.T48:61A

(8)始建国三年十二月丙辰朔丁丑,不侵候长茂敢言之,官檄曰:部吏九人,人一鸡,重六斤,输府,遣候史若祭酒,持诣官,会月二十日。谨案:部吏多贫急毋 E.P.T59:56

简(5),候官负责戍吏掾谭召万岁候长宪诣官,是为了调查与宪有关的事件情状。简(6),可能是候官让下级戍吏在行塞官吏之前要处理好某项事情,并诣官上报。简(7)似为召候长当持某劾算文书赴官校验。简(8),候官命不侵部每位部吏准备上缴腊祭的鸡,并让候史从事祭祀活动^①。

其三,候官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发出召会命令,下属部隧必须无条件执行,违背者将受到惩罚。这种情况可从候官下属部隧吏卒的“诣官”时间获知,如:

(9)惊虎隧长诃召诣官八月戊戌平旦入 203 • 11

(10)万岁候史殷召诣官月甲寅平旦入 286 • 30

(11)第十七候长立召诣官十二月己巳蚤食入 161 • 7

(12)吞远隧长秦岑召诣官十二月丁酉食时入 E.P.T65:5

(13)第十候长相召诣官四月辛酉铺时入 E.P.T5:83

(14)三燧隧长良召诣官六月辛亥下铺入 168 • 18

上列诸简,都是甲渠候官的部隧戍吏奉候官之召,到达候官的记录。有研究者发现具体的诣官时间涉及 10 个时称:平旦、日出、蚤食(朝食)、食时、食坐、日中、铺时、铺坐、下铺、日入^②。现有记录说明,候官可以根据公务的需要随时发出召会书檄,并且召会命令有严格的时间要求,而且如简(9),惊虎隧属城北部,遗址位置当在 T106 至 T110 之间,简(10)的万岁候史驻扎的烽燧遗址当在 T9 至 T21 之间,这两隧离甲渠候官鄯城距离有七八公里不等^③。这些部的戍吏,皆须在平旦之时(上午 6:00-6:45)到达候官^④。再如简(11),第十七候长驻守第十七隧。该隧考古学遗址编号为 T9,与甲渠候官 A8 遗址直线距离为 11457.67 米^⑤。假设两地道路平坦,通行便利,候长立亦须凌晨出发,至蚤时(上午 8:15-9:00)方能抵达候官。比较简中其他隧距离候官的远近以及戍吏抵达时间看,很有可能,候官根据情势随时发出召会命令,而部隧吏卒应该是迅速奔赴候官,丝毫不敢拖延的。

对拖延执行召会命令,未能按期完成任务的吏卒,候官将对其执行严格的处罚。如:

(15)诣就来召强,白马在田,故未就马蒲去,月十一日强不诣官,即劾强,问强十二月 46 • 33

(16)万岁候长田宗,坐发省治大司农茭卒不以时遣吏将诣官,失期,适为驿马载三燧茭五石致止害。61 • 3, 194 • 12

(17)候史广德坐不循行部、涂亭、趣具诸当所具者,各如府都吏举。部糒不毕,又省官檄书,不会会日,督五十。E.P.T57:108A

上述数简说明,部隧吏卒受候官檄书所召,私自拖延停留,不能按时前往候官,即被候官检举起诉,验问追究,乃至定罪。简(16),万岁候长田宗因为“诣官”误期,被处罚承担运输茭草的劳役。简(17),候史广德没有按檄书要求,处理完公务后赴候官禀报。犯下诸项罪责,最终承受杖刑。

四 甲渠候官的管理手段

上文分析了甲渠候官领导和管理部隧工作时使用的三种主要手段,即文书掌控、行塞和召会。这

① 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简牍集成》第十一册,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5 页。

② 孙闻博:《河西汉塞军人的生活时间表》,“甘肃省第二届国际简牍学研讨会”论文,甘肃兰州,2011 年。

③ 据甲渠塞遗址经纬度、各遗址间直线距离(参见罗仕杰:《汉代居延遗址调查与卫星遥测研究》,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003 年版,第 88~94 页),结合李振宏对烽燧遗址位置的考证成果(参见李振宏:《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第 162~165 页),并参照卫星影像导览系统(Google Earth)显示的部遗址分布走向,得出上述判断。

④ 任杰:《秦汉时制探析》,《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 年第 4 期。这几则简涉及的汉代时制与今天时制的对应关系,均参考任文。

⑤ 邢义田:《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第 236、247 页。

三种手段互相联系,并行不悖,在不同侧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甲渠候官的文书掌控手段得以有效实施,凭借的是部隧时呈报的各种簿籍文书,如反映部隧日常工作的日迹簿、作簿、邮书课以及俸禄、现钱、廩食、兵物等各类簿籍。根据各类籍簿文书之间的固有联系,并比较候官和部所存文书的异同,候官由此掌握部隧的工作、物资以及吏卒人员等基本情况。但是,文书掌控方式也有不足:簿籍文书不能准确反映下级机构的实际工作情况。文书记载的不实,在汉帝国的实际政治活动中常常可以见到,这种情况甚至引起了朝廷的警觉。如《汉书·宣帝纪》载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诏书:“方今天下少事,徭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汉宣帝认为,承平之世百姓仍然贫困、盗贼横行,其根源在于郡县等地方官吏渎职枉法,地方上报的簿籍文书徒具空文。汉宣帝诏书指出的文书弊病,在甲渠候官的实际运转过程中也能够见到,如下列各简:

- (1) 𠄎误以糜百卅四石八斗二升大为粟禹为书误 E.P.T58:91
- (2) 自少八月为书误 E.P.T59:77
- (3) 宗前受芟五十二积今白五十三积多一积误毋状当坐罪当死叩𠄎 317·11A
- (4) 虚积八日解何甚毋状檄到𠄎 156·35
- (5) 𠄎等吏秩皆百石移簿书事以误乱为常官 285·20
- (6) 𠄎坐移正月尽三月四时吏名籍误十事適千里 185·32

上例诸简,皆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内容都与文书的记录出现差错有关。像简(1)、(2)、(3),戍吏误把糜书写为粟,或是出现统计月份的差错,或是上报芟草时数量出错,这些可能是戍吏日常工作中的无心之失。而像简(4)、(5)、(6),戍吏上报年度日迹簿计算劳绩时虚增天数,或是向上级移呈的簿书中错乱多有,或是吏名籍出错竟以十计,这些应当是戍吏工作怠慢失职,因而导致文书内容错乱。甲渠候官的文书掌控能否成功,文书记录的真实性最为关键。下级戍吏制作和上报文书时敷衍塞责,以致文书记录不实,无疑会对屯戍机构的正常运转造成危害。

甲渠候官遗址出土的“丁宫等入关檄留迟推辟牒”记载,居延都尉府要求甲渠候官对丁宫等人入关的檄书滞留迟误的情况展开调查,以追究负责吏卒的责任^①。甲渠候在如实汇报时,还要加上“领职教勅吏毋状叩头死罪死罪敢言之”(E.P.F22:131)一段。这可能只是当时的文书套语,但从中仍然透露出甲渠候对下属吏卒的失职行为负有领导责任时的惶急不安。这一事情的发生,主要原因应当是承担此次任务的部隧制作的邮书课不实。看来,甲渠候官必须使用其他手段进行监管,以最大限度弥补文书掌控的不足。

从简牍材料看,候、塞尉及其所属掾、令史、尉史等戍吏亲临塞防,行塞检查,实地掌握部隧工作的现状,可以有效避免文书掌控的不足。永田英正认为,候官必须严格审核部隧提交的簿籍,并亲临现场直接审查,才能避免工作失误^②。我们注意到,部隧日常工作的真实状态有时在簿籍文书中是无法显示出来的。例如,“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E.P.T58:108)指出部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亭不涂”“毋深目”“表小弊”“回门坏”“狗笼少一”“积薪卑小”,全都涉及部隧基本设施的日常维护。这样的维护性工作,在部隧上报的文书中是难以得到充分体现的。而行塞这种手段,恰恰能够涉及文书掌控不能抵达的真实场域。同时,候官的候、尉等戍吏亲临现场对戍吏的考评、奖惩和监督,也有利于密切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在军情紧急或出现突发事件时,候、尉等行塞,亲临现场指挥,对维护甲渠塞乃至居延屯戍区的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召会与文书掌控之间,也是一种互相配合和互相补充的关系。甲渠候官使用召会手段时,往往是针对部隧工作和吏卒公私事务中出现的各种特殊情况,如查验吏卒违法失职行为、安排临时性事务等,利用官记、檄书具有的限时性、强制性特点,追查相关吏卒的责任。各部隧呈报的文书如存在不实问题,候官主管戍吏可迅速对部隧人员当面责问,使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

① 罗仕杰:《〈丁宫等入关檄留迟推辟牒〉问题研究》,参见罗仕杰:《居延汉简甲渠塞人物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2001年,第183~191页。

② 永田英正著,张学锋译:《居延汉简研究》,第314~318页。

总的说来,甲渠候官的文书掌控针对的是部隧带有周期性、重复性的日常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部隧文书记录的真实可靠。因为甲渠候官的吏员数量有限且工作繁忙,行塞在时间节律上并不经常发生。候官戍吏的行塞记录相对较少。但是,行塞对候官掌握部隧吏卒的工作实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又可起到督导激励作用。召会作为候官的治理手段,涉及范围除部隧日常工作之外,还包括大量临时性事务的安排以及调查部隧吏卒违法失职、解决吏卒债务纠纷等,多为特殊情况时使用。文书掌控、行塞和召会三种手段的综合运用,方能保证候官机构的有效运行。

五 结 语

汉帝国统治的实现,依靠的是具体的、微观的官吏日常活动和工作实践。我们考察甲渠候官的日常管理,正是为了从微观角度观察汉代政治。为此,我们从分析反映部隧主要工作的日迹簿、作簿、邮书课三种文书入手,集中讨论了甲渠候官的日常管理。甲渠候官利用日迹簿、作簿、邮书课这三种文书,全面掌控了部隧吏卒的日常工作及活动状态。为弥补文书掌控方式的不足,甲渠障候等戍吏又用行塞、召会等手段,对部隧的工作或进行实地巡察,或进行当面问责,或进行特别部署,最终实现对下级部隧工作的有效管理。在汉帝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制度之下,甲渠候官管理手段的运用正是边郡候官运行机制的体现,也是汉帝国统治力量在边郡地区得以实现的一个缩影。

收稿日期 2014-05-22

作者张文瀚,历史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河南,新乡,453007。

Research on the Routine Administration of *jiaqu houguan* of the Han Dynasty

Zhang Wenhan

Keywords: the Han dynasty; *jiaqu houguan*; routine administration; control of document; inspecting frontier fort; calling to meet

Abstract: The study of routine administration of *jiaquhouguan* is helpful to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houguan* on the Han frontier, and even provides an angle for studying the routine management of the Han dynasty. In routine work *jiaqu houguan* mainly commanded in three ways, namely documents management, inspecting frontier fort and calling to meet. Document had daily book, worksheet and mail letters three kinds and recorded separately daily or monthly the troop affairs, to ensure *houguan* as well as the higher institutions could easily supervise the work and activities of each soldier. Inspecting frontier fort means that *jiaqu houguan* and his following soldiers made inspection visits to the defense area in a regular or irregular way, in order to make clear the real work conditions of the troop. Furthermore, *jiaqu houguan* could summon following officers to his office in a certain time by various written orders to report to him, or accept preliminary tasks. This method is calling to meet. These above three means complemented each other and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operation of *jiaqu houguan* mechanism.

【责任编辑 叶子玉】